

情僧诗僧

妙、多、才、华

刘诚 盛晓玲 著

学林出版社

一生都和情产生不解之缘

的诗人

又终身以佛陀为人生皈依

的僧人

南社 革命党人 花酒 糖僧

情僧诗僧

苏曼殊

刘诚

盛晓玲

著

学林出版社

佳人名小品

绝世已无俦

横波翻泻泪

绿黛自生愁

舞袖倾东海

纤腰惑九州

传歌如有诉

余转杂笙簧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僧诗僧——苏曼殊 / 刘成, 盛晓玲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4.5

ISBN 7-80668-705-X

I . 情... II . ①刘... ②盛... III . 苏曼殊(1884~1918) —传记 IV .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 第 020645 号

情僧诗僧——苏曼殊



作 者	刘 成 盛晓玲
责任编辑	曹坚平
封面设计	鲁继德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	上海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印 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
开 本	640 × 965 1/16
印 张	12.25
字 数	18 万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68-705-X/I · 200
定 价	18.00 元

情僧与诗僧苏曼殊

苏曼殊，是个一生都和情产生不解之缘的诗人，同时又是终身以佛陀为人生皈依的僧人。

他短短三十五年的生活历程，是在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剧烈的动荡中度过的。乱象频生，苏曼殊常常有意无意地被牵入动荡漩涡的中心或接近中心的边缘，成为众生所瞩目的人物；而他内在的情感世界，既欲远离沸羹蜩螗的现状，又对民生国事倾注了极大的热忱。人生即是矛盾，对于苏曼殊来说，似乎更有实际的缘由；然而，他遁迹佛家之清静的精神范围，不仅是为了消解、对抗昏暗浊世的有形、无形的压力，并且也有与生俱来的因而是难以解脱的宿命的推力。

寻花问柳的行径，是苏曼殊意欲避世以求慰藉的另类举止：灯红酒绿和轻歌曼舞令人迷醉，那些善解人意的女性，能给苏曼殊带来他人无法替代的温情及刺激。在这个诚心向佛的“和尚”、“大师”眼里，妓女的存在是天经地义的；他在海外乃至病重时，还念念不忘上海的那一群可人的年轻女子。“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佛家如此说，苏曼殊是否也以此作为支配自己的为人和行事的意识呢？由于他终身未娶，又自幼缺少家庭的关爱，因此，对女性的兴趣和钟情，是心理上的一种自我补偿。

苏曼殊的本性是诗人，只有诗歌才能承载和化解个人的真实的丰富的情感。

他的诗歌（还应包括绘画）使他生命的存在个性化和艺术化了。从古典诗歌的源流上看，其风情和格调远契中、晚唐，近则得益于龚自珍；一些诗篇弥漫着伤感及哀怨，无疑，这是其一生依止不定的流离生涯的投射，也是对于男女之性爱的欲离还即、欲即还离的矛盾情感的显露。豪迈硬朗之气的匮乏，似乎和他的革命意志相背，但这恰恰表现了苏曼殊诗歌独特的内向性。换言之，他写作的情态就是精神上的内视反省，寻愁觅恨。

目 录

前言 情僧与诗僧苏曼殊	1
汉、和混血儿的夙慧 日本横滨	1
心灵的创伤 香山－上海－横滨－东京	8
潮起东瀛 东京	15
初试锋芒 上海	21
从湘江到珠江 长沙－香港	33
古寺孤魂 香港－惠州	39
白马投荒第二人 中南半岛	45
激情和温情 上海－长沙－杭州－南京	53
大师？教师？ 长沙－东京－芜湖－上海	63
梵文的绚丽和庄严 东京	72
心造的画境 东京	79
法螺声声 东京	86
困境中的柔情 上海	93
结缘拜伦与雪莱 东京	99
无计逃禅奈有情 东京－上海－杭州－南京	115
恨不相逢未剃时 东京－水户－长崎	125
椰风椰雨 上海－杭州－印度尼西亚爪哇岛	140
“糖僧” 广州－上海－东京	150
断鸿零雁 爪哇－东京－杭州	156
“南社”与吃花酒 上海－日本	165
弱不胜衣 安庆－上海－苏州－日本	175
“一切有情，都无挂碍” 上海－日本	182

汉、和混血儿的夙慧

——日本横滨

1884年(清光绪十年、日本明治二十七年)9月28日的正午，一个男婴降生在日本横滨的云绪町一丁目五二番地。这个刚刚从混沌中发出啼哭的小子起名为苏戬，家人以“三郎”称之。成年后，号子谷，曼殊二字是他众多别号中用得最频繁的。

苏曼殊的父系祖籍是中国广东省广州府香山县白沥港(今珠海市沥溪村)。父亲苏胜，字杰生。嫡母黄氏，与苏胜系同乡。慈母河合仙，出自日本一个有相当门第的家庭，嫁给苏杰生后未育(?)，因此视三郎如己出，疼爱呵护有加；苏曼殊终其生都以无限的仰慕牵挂惦念着她，然而他似乎不很明白自己的生母究竟是何人。关于苏曼殊的身世和籍贯，其友人多次的询问往往得不到回应，有时，他对



REV. MANDJ

苏曼殊僧装像



苏曼殊之父苏杰生

类似问题的提出，索性就“泫然叹息，俯首不答”；别人也无法推测此中情实。其实，牵萦其怀的，是从孩提时起就一直感受到的河合仙给予的深沉宽博的爱心(中国古代也将抚育孩子的女性叫作“慈母”，故以此称河合仙)。

河合仙的胞妹河合若，从家乡神奈川逗子樱山来横滨帮苏家料理家务，与苏杰生私相媾合后产下三郎；为避人耳目，在怀孕时，曾另赁屋暂住。数月之后，河合若返回家乡，河合仙承担起养育三郎的职责。苏曼殊日后的恋母情结，显然与河合仙从幼年就给予的悉心照料宠爱有直接的关系。苏杰生之所以与妾之妹有此一手，据说是因河合若胸前生有一颗红色的痣，从中国的相法看，这可能是诞生贵子的迹象。当然，小苏杰生二十岁的河合若天然地就有一种少女的引诱力，日本女性的柔顺与体贴比起中国的女性来毫不逊色。在日本，作为一家之主的男子如果和其他女性产生情感与肉体上的暧昧关系，一般很少受到非议和指责，他的妻子即使不满也只能忍受。而且，侨居日本的中国男子无论是否有家室，大都好与日本女子同居，并能和主妇相安无事。据说，横滨唐人街就有这样的习惯。苏杰生跨出的这不伦的一步或许会给这个家庭造成一定的骚动，幸好河合仙对妹妹的情义及对新生儿的怜爱使三郎仍能享受天伦之乐。

河合仙主动扶养三郎的善意也与日本民族的家庭观念有关：妇女在家中的地位，只有做了母亲后才能获得，因而，没有孩子的妇女属于失败者，她们会为此感到哀伤。此外，多生子女是往昔日本女子的普遍希望。在20世纪的早期，日本的人口出生率依然很高，这显然和中国人“多子多福”的意识是相似的。河合仙的善举可以认为是对她在苏家未生育(或生育的子女过少)的内在补偿。

在日本的家庭中，对孩



苏曼殊与外祖父母

子的教育，父亲常常是用寥寥几句训诫的话语了事，母亲才是主要的角色。苏杰生奔忙于生意上的事务，平日少有闲暇关心三郎。苏曼殊于二十岁时，作《呜呼广东人》一文，对“天然媚外”的同省人施以严厉的斥责；他的父亲苏杰生所从事的职业，正与此文 中他不齿的行为类同。也许，三郎当时幼小的心灵里少有对于父亲的敬爱亲切之情，并导致日后父亲病重及离世时都不愿回家省视和探望。在苏曼殊的各类文章中，几乎找不到父亲苏杰生的踪迹。

苏杰生于19世纪60年代赴日本，经营日用品的买卖，后入英商所开茶行任买办。苏家祖辈在广东家乡有一定的财势，殷实的家庭主要来自经商。近代中国的买办阶层，早期多出于广东一带，晚清著名学者王韬在《瀛壤杂志》中，论及粤人于“中外贸易”时说：“大半在西人处经纪通商事务”，巨额的财富在顷刻间“赤手可致”。粤人经商的足迹不仅在东南沿海开放的各口岸驻留，而且远涉海外，苏家只是其中的一员而已。可以认为，苏家的先人是近代经济潮流中得风气之先的家族。

明治维新后的横滨，在日本对外贸易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商贾云集，熙熙攘攘；其港口的容量在这岛国的沿海地区也是数



苏曼殊与母亲河合仙



《苏曼殊全集》



苏曼殊像

一数二的。当时的日本政府采取鼓励外国人落地本土、进而成为归化之民的政策，因此，在像横滨这样的城市里，就聚集了数量相当可观的包括华人在内的外国人。经纪茶叶贸易，本为广东人的擅长之事。上海《申报》在光绪六年的一期中，特地提到在福州某地经营茶叶的“买办多广东人，自道、咸以来操其术者，皆起家巨万”。从其他的一些记述中还可以知道，在广东之外的一些地区的茶行中，都可见广东人忙碌的身影。茶叶是晚清中国出口的大宗物品，从事此业者形成了早期的近代商人群体。买办苏杰生在日本的经营活动，得益于国内的茶叶出口的经历是无疑的。

苏曼殊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家庭中孕育，汉、和民族的某些本能和文化特质在他的血液中流淌，但他日后的为人及行事中流露出的性情更多地偏向中国人。这不仅缘于父亲或男性是家庭和社会的统治者这一事实(东方民族尤其如此)，也取决于苏曼殊成人过程中对于人生的认识与选择。

初生的三郎看上去和普通的日本孩子没有两样。

由于是在生母孤居时呱呱坠地的，又由于她并没有母亲的名分，心情不免有些沮丧和压抑；且因为父亲本想瞒着众人，所以，新生儿问世不久之后的照应势必会受到不利影响。三郎出生时的处境确实使他的身体有点先天不足，母亲心疼他多病的弱体，在他成年之后还不止一次地回忆念叨。三郎小时默言寡语，年长后依然有不喜与人交谈的习惯。

1887年，也就是四岁那一年，一个平常的日子，三郎伏在地上，埋着头忘情地画着什么，大人们一看，地上竟然现出一头栩栩欲活的狮子。三郎对狮子的印象应该来自于动物园，或者是画片；然而，唯有这个兽中之王在他的脑海里腾跃。而狮子本身有什么意味呢？佛教的《大智度论》说，“佛为人中狮子”；佛讲经发声宏亮，如“狮子吼”。画狮子这件早年之事，是苏曼殊日后的自白，也许是他内心向佛后的联想。如果实有其事，可能说明他的慧根早已超凡。

日本的奈良时代(588—780)，中国的佛教经由朝鲜半岛西南部的百济传入后，极其深刻地左右了日本文化史与社会生活的进程。这一时期，人们竞相营造寺院，信众亦大量增加。当时的僧侣们头裹花布，形成一道引人注目的景观。这种装束在后代还时有所见，在三郎的眼里，这些裹头法师都是有趣的人，于是他也想仿效，装模作样地用一块花布套在头上。这一场景，显然带着点奇趣；当后来人们称苏曼殊为“和尚”或“大师”时，幼年的一幕会情不自禁地回到他的记忆中。

裹头法师的形象源于佛教在日本的演变，也是佛的概念

在苏曼殊心中的象征。然而，这种象征只停留在感性的层次上，更可能的是，这一形象勾起了三郎的遐想：在他生活的世界之中，还有另一种人的存在。而这一种人将他的思绪引向莫名的远方。

苏曼殊1911年托日本僧人飞锡之名作的《〈潮音〉跋》中有如下忆述：

一日，有相士过门，见之，抚其肉髻，叹曰：“是儿高抗，当逃禅，否则非寿征也。”



苏曼殊绘佛像

孫文題
圖

曼殊遺墨

孙文题字

三郎头上的肉髻，在相士看来是非凡之征，释迦牟尼头上即有此隆起之物，佛教信徒称佛陀生来具有神异的容貌，有三十二大人相之说，其第三十一相为“顶髻相”。由此看来，苏曼殊后来的“逃禅”，本有天性或禀赋上的缘由。小小年纪，就被人认作有“高抗”之气，岂不是说：这孩子将来难以与世人和光同尘，会执着地朝自己认定的路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佛家说的三千大千世界里，人如恒河沙数般的不计其数，可三郎却似乎是前因注定了的要与众不同。可是，三郎自己会有如此的意识吗？

按照日本的习俗，婴儿出生三十天后，母亲会用一根双股带子系住孩子的腋下和臀部，背着他外出，他也试图伸展手脚让自己舒服一点，或者挪动一下换个姿势。河合仙对三郎的怜爱是无微不至的，她对背后的儿子指点着远近的物品和景观，说说笑笑；三郎似懂非懂，随着母亲的手指，眼光四处巡游。

河合仙将她自己的父母接来横滨云绪町，和外孙三郎一起度过一段时光。在祖孙三人合拍的一张照片上，身穿和服的小三郎的眼神里确有一种灵慧并透出些许出神的意态；在两个慈祥和善并略有点紧张的老人之间，三郎显得那么自在，带着童趣怔怔地凝视着前方。从在母亲的怀抱里的相片一直到身着袈裟或西服所摄之像，苏曼殊的神态大都相似。

母亲河合仙及外祖父母忠郎夫妇，还有生母河合若，是苏曼殊人生最初的蹒跚学步阶段接触比较多、因而也比较亲近的几个家人。

忠郎曾携三郎去郊野及海滨远游。三郎大概是第一次投入大自



苏曼殊袒肩像

然的广阔的天地之中，可以想象，他是如何地欣喜异常：平原旷野、川流山崖、沙滩海浪，向三郎显示了无穷的魅力。此刻的三郎当然还不可能从中领悟到什么，但他对山光水色的向往始于早期的经历，远游也贯穿于他的一生。跟随着外祖父的三郎，学着大人的样子，在小艇中划桨，时而又投竿于水里钓起鱼来；他还和同伴一起攀崖，这可是有点冒险的行动；在草地上飞奔时，看起来是最畅快的。

三郎的童年是有缺憾的，然而，他从日本母亲河合仙那里享受到了真正的母爱，温馨感时时涌上心头。他回到中国后，又多次东渡扶桑，除了求知外，主要就是为了探视他心中永远的慈母。

由于父、母的遗传基因有很大的差异，他的血液中混合着汉、和两个民族的气质，无疑，远距离的血缘的结合会造成智力和体格上的优异(只是初生时照顾不周，才体弱多病)。人们目苏曼殊为文学艺术方面的天才，这和他的特殊出身是大有关系的。

六岁时(1889)，三郎暂时告别了日本，他的童年生活将回到中国故乡延续。

心灵的创伤

——香山—上海—横滨—东京

东海滔滔，水天一色。

自 19 世纪后期起，往来于中日之间的轮船就不绝于途；或经商，或求学，或探亲访友，或亡命海外，等等。颠簸之中的人们怀着希望和憧憬、惆怅和无奈……

此刻的苏曼殊，正与嫡母黄氏及舅父黄玉章乘海轮向广东家乡进发，同行的还有庶母大陈氏之女苏惠玲。随着海浪的起伏，尚懵懂不甚了事的苏曼殊的大脑正在拼凑着家乡的模糊图景。船中的各色人等带着不同的表情，在他的眼前晃动。从小就欢喜在纸上涂抹的他，目光投向了一艘迎面驶来的汽船，情不自禁地索要纸笔画了起来。

回到祖籍所在，应该说是苏杰生和黄氏的主张：逐渐长大的三郎已经到了就学的年纪，他的根基在中国，祖先的在天之灵会召唤后代们回到华夏大地、回到他们世世代代生息的故乡。

祖父苏瑞文、祖母林棠，对于在遥远的异乡出世的孙儿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二老非常仔细地从上到下打量端详着苏曼殊：“阿戬这孩子的身体里流着东洋人的血呢……”这样想着，但眼光里还是流露出了慈祥及宽慰：这孩子毕竟是咱苏家的后人。

离开了母亲的苏曼殊完全

苏氏族谱

被笼罩在与日本横滨不同的氛围中，到处都能遇到新奇的甚至带有怪异的目光；他觉得自己差不多成了村子里最引人注目的人了。由别人直直地注视的感觉可不怎么好受，而这样的眼光又几乎无法避开。如果在日本，他可以躲入母亲宽广的怀抱，母亲会给儿子精神和心灵上的翼护。而眼下，周围的自家人，从祖父母到兄妹、叔婶，有的亲近，有的疏远，谁又能无微不至地觉察出他心底的不安、惶惑呢？很快，被冷落的感觉产生了。苏氏是个颇大的家族，年纪和苏曼殊差不多大的孩子有一群。看着那些无忧无虑的兄弟姐妹们，父母在一旁的叮嘱及呵护，疼爱的脸色，他的鼻子不由发酸。于是，河合仙那熟悉的微笑的面庞不时地浮现。

更令人心寒的也许是那种视之如“杂种”的不屑神色与窃窃私语。在归国之后的多年里，苏杰生的其他侍妾天然地对他抱有敌意。年少的苏曼殊忍受着孤独寂寞的煎熬，他孱弱的身体实在不堪承受这样的精神压力。他的言语一天一天地少了，即使有人逗他说话，他也往往心不在焉。沉默往往是此时的他唯一的举动。

幸好，在简氏大宗祠村塾的读书时光给苏曼殊带来了一些快意和安慰。塾中同学有他的两个叔叔和兄妹们，其他沾亲带故的也不少。大家常在一起多少抵消了他的孤寂感。读书之余暇，还与长兄苏煦亭、堂兄苏维翰等到野地里游玩，孩童调皮的天性又回到他的投手举足中。他甚至还时不时地戏耍自己的兄长，于是，在兄弟间的手舞足蹈的嬉闹的混乱中，苏曼殊暂时地忘却了烦恼和苦闷。

苏曼殊具有很强的求知欲，塾师苏若泉赏识这个学生，也一直给予勉励，因而，自家的弟兄姐妹们不由不刮目相看。

村塾所教授的，主要是中国传统的小学和经史，也有一些文学知识，如诗词的诵读、联句作对等。从苏曼殊的知识结构来看，诗歌与近似于小说的笔记类作品的分量较重。其妹惠珊后来回忆说“三兄曼殊素爱文学”，并且小楷书写端正整齐。绘画尽管非塾中所授科目，苏曼殊依然乐此不疲，一幅幅画被堆叠在家内的书柜里。他的这位妹妹受到感染，也欢喜“选读三兄所读过的书”。

就中国传统文化与知识而言，苏曼殊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塾中六七年只是起始的一步，他日后的文学业绩，是在人生成长的过程中不断求知，不断汲取新知识、新学理而致的。但是，传统意识在其作品中的表现仍然是确实而明晰的。

1892年(光绪十八年)，已经九岁的苏曼殊正埋着头在书籍中巡阅，忽闻听父亲从日本归来的声息。

与广东故乡睽违已久的苏杰生满怀沮丧，他在日本的经营活动失败了；如不打算另谋出路以改变现状，以后在日本的生计将愈益艰难。随他一起回乡的还有他两个妾大、小陈氏及几个女儿。除了河合仙，苏杰生中国血统的妻妾们都已归至故土，而且，此后苏杰生再也没有重返日本。

与父亲本有些隔阂的苏曼殊的眼光在父亲脸上只停留了片刻，不知道说什么好；他还避开了庶母有些威严的盯视；两个妹子带着好奇对小哥哥瞧个不已。苏曼殊茫然又怀着企望地将目光朝别人的缝隙间探究，“我的妈妈呢？……”

村塾中的读、写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在继续，苏曼殊的心中多了些许伤感。他隐隐约约地觉得母亲与嫡母、庶母是不同的，否则她为什么让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这儿呢。祖父母，还有几个大人有时也会问寒问暖，但他们无法取代母亲的挚爱和悉心呵护。

苏曼殊深深地思念起远隔重洋的母亲来，恍惚中，母亲轻轻抚摸自己的头，柔柔的声音令人心醉：“三郎，妈妈来了……”

幻觉过去之后，苏曼殊陷入哀伤：“我是日本人，我的妈妈也是日本人，所以……”

在日本东京和生母河合若及外祖父母共同生活的一段时期，老人为三郎取了个日本名字，叫“宗之助”。在广东地区，即使有中国血统的父亲(母亲为外国人)、即使相貌与国人无异，也被称作“番鬼仔”，或以“杂种”咒之。苏曼殊自认是日本人，未必是因为他不清楚父亲为中国人。

父亲对儿子的关爱本来淡薄，但与父亲的团聚毕竟使孤寂无依的心有了一点倚靠。父亲偶尔也会说些你妈妈在日本如何如何的话，可是苏杰生的脑子更容易被生意占据：家中一大堆人个个张着吃饭的嘴，商业都市上海正诱惑着商人苏杰生的本能。回到沥溪两年多后的1895年，他即远赴上海再次从事他的经营本行，同往者是庶母大陈氏及其女儿，长兄苏煦亭则被遣至日本横滨习商，苏氏家族的商业经营活动的延续是维持整个族人的生计所必需的。苏曼殊一生似乎未曾涉足此道，然而，他离家独自生活的费用有时也仰赖家族。

父亲的离去，可能给苏曼殊内心造成了恐惧，他由此而得了一

场大病，并险些送命。于是，就在苏杰生赴沪的下一年，忧心忡忡的姑母苏彩屏将侄子携至上海父亲处。

大陈氏的裙边有一群女儿，但未生一个男儿，对苏曼殊怀有天然的嫉恨和不满。她用手直指：“你、你这个不知哪里来的杂种！”有时大声叫道：“滚回你日本臭娘们那里去吧！”她眼里透出的神气常使这少年不寒而栗。而苏杰生对此并不怎么在意；再说，他也无暇为此事而分心。对慈母河合仙的温馨安详的回忆常使苏曼殊入神，而当下，庶母的淫威引起了他内心的惊恐不安，这两者间的反差是如此的强烈而鲜明。体弱少年的心灵岂能忍受这样的重负和压抑？

这一时期，少年苏曼殊的命运是坎坷的甚至是不幸的，这不能不影响并左右他日后的人生历程，使他的人生观染上了揉杂的灰暗的色调。当他投入到那嚣扰纷繁、五光十色的大千世界中去的时候，所经历的多忧少乐的情形像幽魂一般挥之不去，各种景象会浮现出来压迫、缠绕他的心胸。

上海期间，一个外国人，西班牙牧师罗弼·庄湘(Lopez Johnson即洛佩兹·约翰逊)进入苏曼殊的人生。这是苏曼殊了解、掌握英语的开始，英语为他展开了一个新天地，步入这个天地徜徉游览，显然使苏曼殊受到了一次洗礼，为他人生的精神及心态楔进新的因素。他和这位牧师的情谊有点不同寻常，可说具有神交的意味；虽然相识一年多之后苏曼殊即赴日本游学，但以后的相晤或书信往来都会使他产生快慰与兴奋。

十五岁的苏曼殊神色庄重，在海轮中凝望着远方的天际……

可以回到母亲的身边了。更令人神往的是，父亲明白地告诉他：到日本去是为了学习。从村塾和西班牙牧师处，苏曼殊已经初步领略了知识的诱惑性和魅力，求知欲是求知的最大动力。再说，与日本分别了这么些年后，故地故物在记忆里已经模糊不清，重睹也会给人带来快意。

横滨中华街的大同学校是华侨开办的，为之命名者是鼓吹儒家“大同”并以之作为变法维新思想武器的康有为。学校的学生最初以广东人的子弟为主。可以想象，当时该地的中国籍(尤其是粤地)人士数量的众多。这年春天入学的苏曼殊从预习中文、英文开始，而

实际上，他进入了一个真正社会化的校园，学校的师生流品丛杂，其中出了一些后来在中国近代史上施展身手的名人，如冯懋龙(自由)就是一位；他在书房里贴了一幅自撰联语：

大同大器十七岁，中国中兴第一人。

所以，苏曼殊说冯自由“少有成人之风”。校中日本教师也有多人。苏曼殊在大同学校从乙班升入甲班，前后一共四年不到时间；其间他还曾经偷偷潜回过广东一次。

苏曼殊的绘画技艺得到同学的公认，索要的人也不少，冯自由由衷地慨叹，说苏曼殊的画可跻身于名家之列。满足别人的请求，会产生愉悦的感觉，苏曼殊当然是一脸的春风得意之色。不过，这种情形对画艺的进一步的提高是大有好处的。慷慨赠画使苏曼殊有了点知名度，有人还想打探他的身世及来历。

一天，课堂上，中文教师陈荫农面露狡黠与油滑世故，不紧不慢地问道：“我们在座的，有没有……相子，也就是混血儿……”台下学生有点愕然，不明白老师为何将讲课的话题突然停下，吞吞吐吐地问什么“相子”。“相子”(Ainoko)是混血儿的日语说法，旅日华侨皆以“相子”指称华父日母之子女。陈荫农接着说：“如果有，把手举一下。”结果，举手的同学占了约一半。苏曼殊是不假思索地举手的，他的经历早已使他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既困惑又敏感。心中的痛又隐隐地闪了一下。

从小缺乏父爱、对母亲却深情眷恋的人，成年后，易于在女性面前产生羞怯感。大同学校虽多为男生，然而，同学间一谈及异性，苏曼殊还是禁不住地红了脸。如果在校外的街巷迎面遇见年轻的女人，他连头都不敢抬起来。

同学们为他起了个“樱开花”的绰号，是指他的脸色因害羞如樱花般地泛红。这一绰号很容易使人生出联想：春天的日本樱花烂漫，而凋零又在瞬息之间，成了生命虽美丽但却短暂这一意识的象征。日本人非常珍惜盛开的樱花，因为花期实在太短。

“樱花红了，你看。”一个同学戏谑他道。

苏曼殊害怕听到这样的话语，他有点恼怒，但抑制住没有发作。对女性天生具有好感甚且喜爱她们的男人才会脸红，“樱开花”之类